

问题的提出

—— 从哈罗德—多马模型说起

它应该是坦诚布公，不自惭形秽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它具有坦率和自豪的资本。

—— 赛珍珠(美国女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经过十八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是速度效益型，表现出高投入、低效率、高通涨、大波动的明显特征（参见图 1）。周期总是由强行加速开始，以各种可以理解的和难以理解的理由扩大银行信贷，或增发纸币，大上项目。各地争先恐后，到处热气腾腾。然而好景总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于是不得不实行“宏观调控”，压缩项目使大量在建工程下马停工，使大量投资沉淀在“胡子工程”中，甚至化为乌有。并迫使基建投资大量占压技改投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投资结构更不合理。抽紧银根造成产成品资金占用上升，企业的亏损额增加，利润下降，令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叫苦连天。经济的这种冷热交替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政府头痛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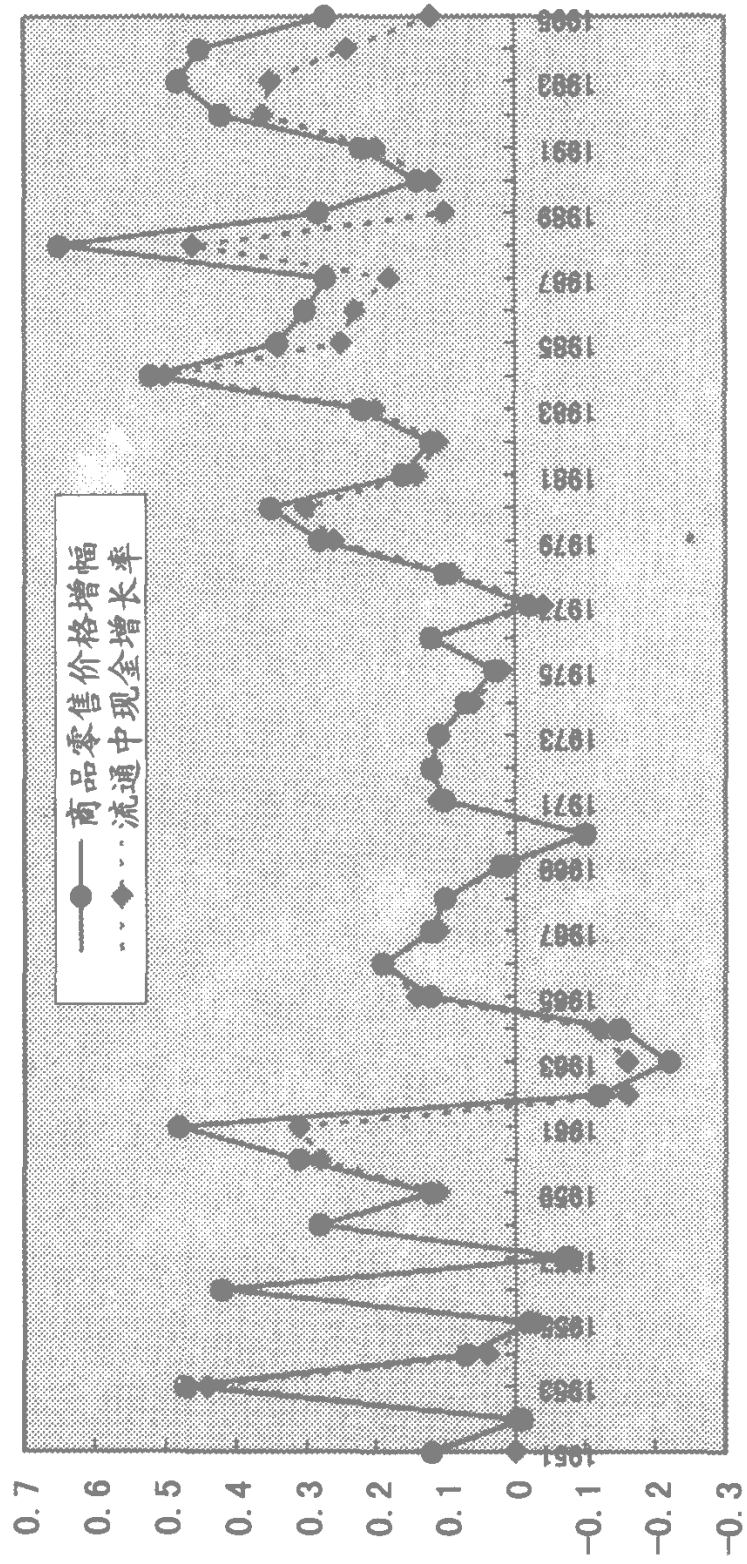


图1 商品零售价格增幅与流通中现金增长率协同攀升

然而中国的经济不应该加速吗？“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几代中国人积累的痛切经验。为了中华民族在下一个世纪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加速发展经济。

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期平均增长速度为 9%。经济理论界广泛认为恢复期结束后，不可能继续维持这一高速度。据此，岸信介内阁于 1957 年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规定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6.5%。经济学家下村治利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对日本经济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日本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达 10% 以上。从而，掀起了一场“高速增长论争”。而事实表明，整个 60 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维持了 10% 以上的增长率。下村治的理论依据在于哈罗德—多马模型：

$$\text{GNP 增长率} = \text{资本产出率} \times \text{资本投资率}$$

他测算出日本的资本产出率为 1。而资本投资率为 0.125，由此得出 GNP 增长率可达 10% 以上。

循着类似的思路分析我国的情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按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1978 年到 1994 年，我国资本产出率平均为 0.1409，而且呈现大幅度波动。最高年份为 0.2279，最低年份为 0.0613；投资率平均为 0.631 最高年份为 0.676，最低年份为 0.585。由此得出 GNP 平均增长率为 8.89%。与下村治分析的日本相比，我国的资本产出率相当的低，9% 不到的平均增长率是靠远高于日本的投资率维持的。

由于这些年来财政收入占 GNP 的比重下降，分配向个人倾斜。0.631 左右的投资率相当程度上是靠财政赤字和银行巨额

不良资产来维持的，从而造成了持续的通货膨胀。1980 年到 1993 年资金运用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82%，比 GNP 年平均增长率高出 18 个百分点，这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这表明了我国目前经济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1. 资本产出率低，只能靠相当高的资本投资率来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2. 投资的资本金来源不足，只能靠扩大银行信贷及增发货币来解决。

于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始终面对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左右为难。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上述两个基本特征不改变，我国不可能有超过 10% 的持续增长。事实上，超过 10% 的增长期从未延续到超过 3 年。而且总是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造成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和资源的大量浪费。

现实给我们提出了两个严峻的问题：

1. 中国的资本产出率能否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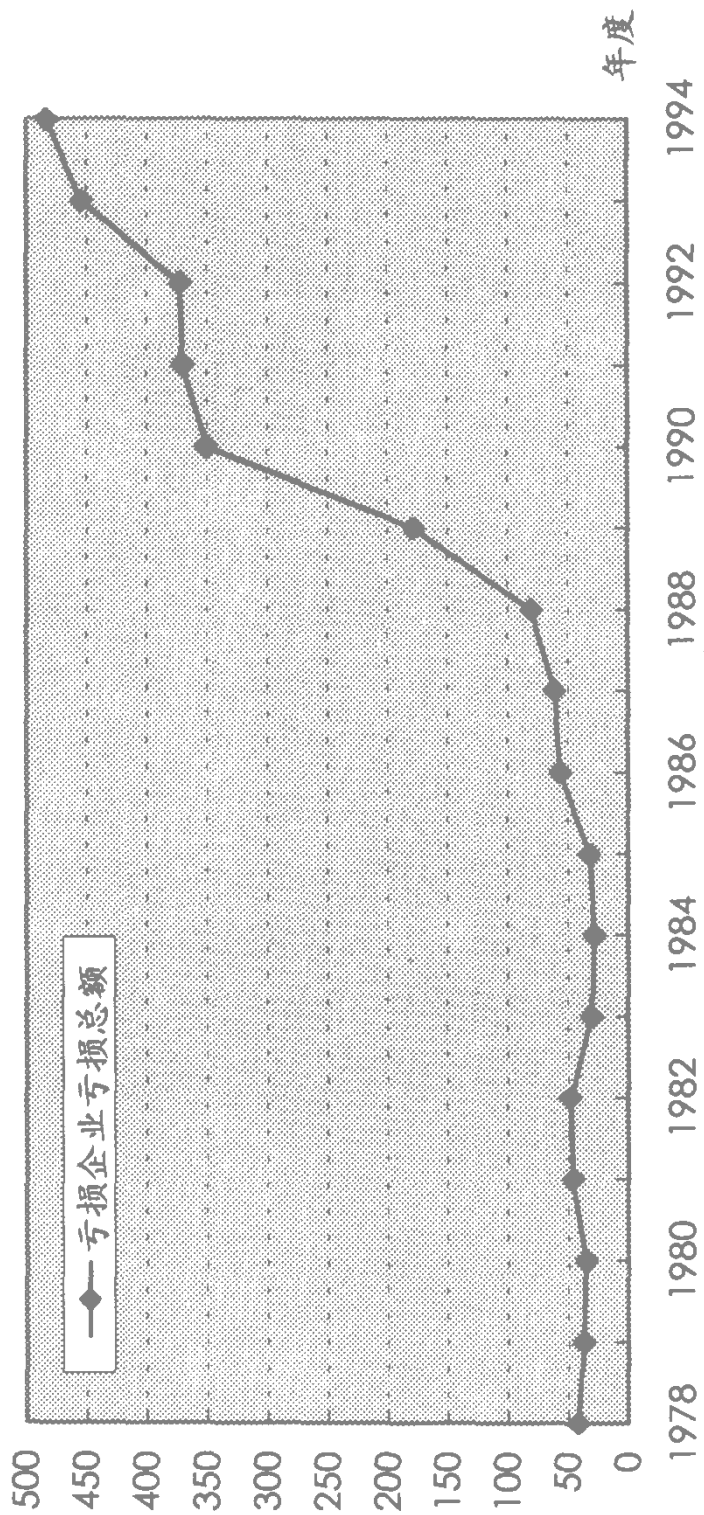
2. 不靠扩大银行信贷及增发货币能否解决投资资金来源？

显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且不说将我们的资本产出率提高到当年日本的 1，只要提高到 0.4，我们就可以用 0.25 的投资率达到 10% 的年增长率，而且这将是极低通货膨胀情况下的持续增长。

那么有可能提高资本产出率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全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从 1985 年到 1994 年利税总额增长约一倍，利润总额基本没有增长，1990 到 1992 年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扩大了 13 倍以上。图 2 表明，亏损总额在 50 亿元以下徘徊十年后，于 1986 年突破 50 亿元，然后如脱缰之马，直逼 500 亿元大关。亏损总额与利润总额之比于 1990 年达到 90% 的高峰，以后虽有下降，仍在 55% 以上。在非国有企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严重的经营不善使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1978 年为 78%，到 1993 年降为 43%。图 3 显示建国以来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走了一条钟型曲线，近年来呈加速下降之势。国有企业职工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 1978 年为 60%，到 1993 年降为 39%。然而仍被行政手段控制的投资机制却未能有相应的变化。1985 年到 1993 年国有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 61% 到 67% 之间波动。1993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 21845 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占 15683 亿元，为总量的 71.79%。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全国人民在几十年计划经济加低工资体制下创造的财富大部分沉淀在国有企业中，却并未产生出应有的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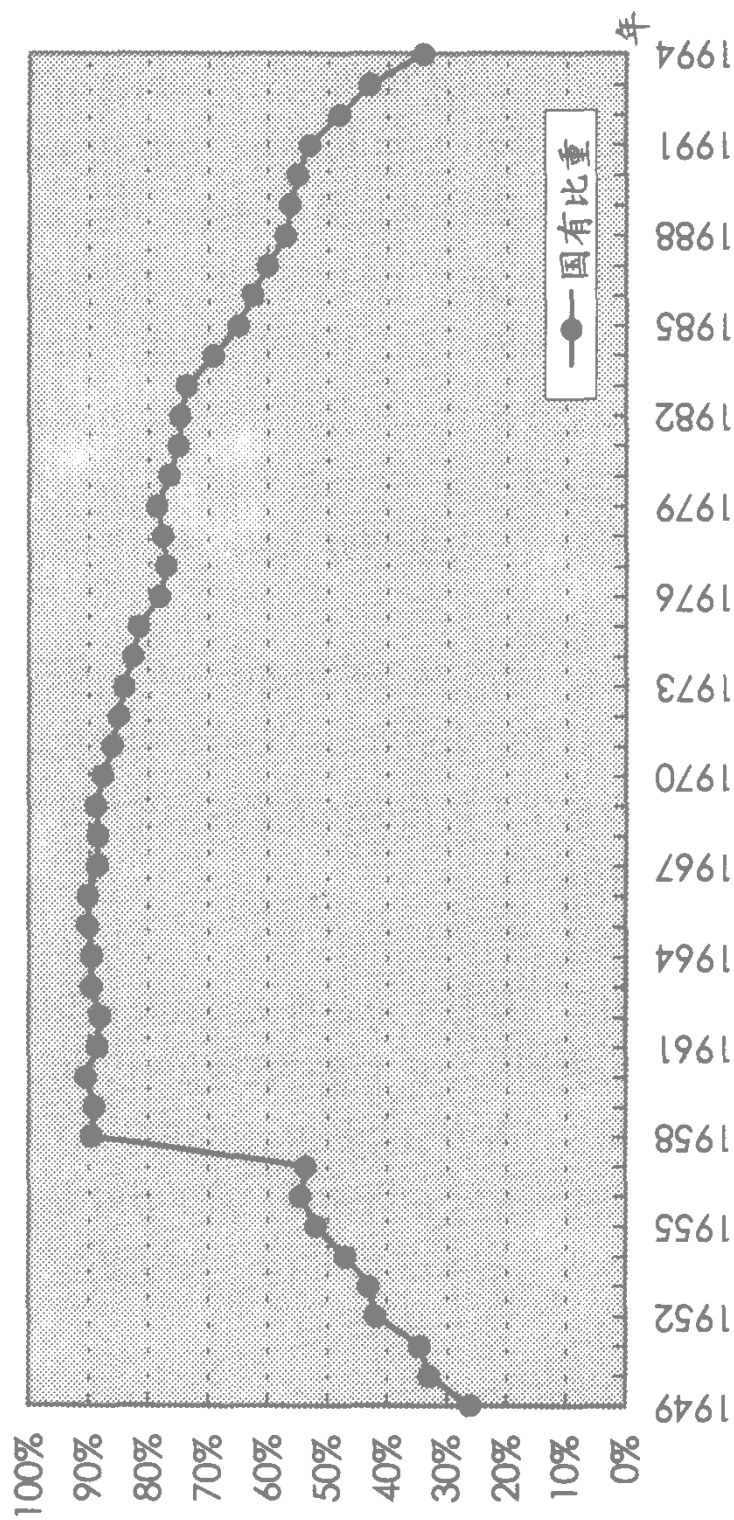


图3 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又占有大多数投资，这是中国资本产出率低的根本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到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早在 1978 年，改革初期就曾以国有企业为首要目标，1984 年又曾试图启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 90 年代后，关于国有企业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有主张改革机制的，有主张加强管理的，有不管黑猫白猫的，有专问姓社姓资的，沸沸扬扬，不亦乐乎，一直争到今天。就在我们坐而论道的同时，统计数据却年复一年无情地显示出国有企业每况愈下、财政收支日渐窘迫、金融形势日益严峻、宏观调控捉襟见肘的现实。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宏观经济的基础。企业应当养政府，应当为银行挣钱。一旦到了企业靠政府和银行养活的地步，要搞好这样的企业涉及的就不只是企业本身的制度与管理，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重组。

有鉴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转向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但总体效果不明显。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中国的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渐进历程，现已触及到问题的关键，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方向明确后，关键是如何实施？

——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问题是谁来抓，当然是主管部门。然而主管部门作为行政系统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利益，其行为必然遵循行政系统的“运行规则”。能帮助国有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它自身必需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发面需要酵母，然而这个“酵母”在哪里？

——抓好大型企业集团试点

中国需要一批大型企业集团，非此无法面对国际竞争。然而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实际上是原来的“部”、“局”翻牌而成的，它的领导人对外改称总经理、董事长，对内还是称部长、局长、书记，仍有行政级别，仍由政府任免。其经营管理仍依赖行政手段，维系集团的主要力量仍是行政隶属关系。这样的集团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环境下有何生命力？

——切实抓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企业当然必需抓好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在于我们总在改革机制与加强管理之间争论，总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机制而在管理。如果加强管理就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当初就不会发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事实上国有企业目前表现出的管理问题无一不与机制有关。

——多渠道增加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资金

资金理应流向最能产生有效供给、最能产生利润的地方。

多年来我们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对只进不出、形成资金“黑洞”的企业大量注资、不断“输血”，其后果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以行政手段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只能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输血”，与那些自生自灭的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生存能力只会越来越弱。

——
.....?

批评是容易的，评论家是潇洒的。然而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创造性的思考和建设性的方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怎样提高中国的资本产出率？

政府篇：资本重置

第一章

资本重置：释放中国经济的最大潜能

事实是决不会自己说话的。

——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

一、“非均衡”的现实经济效应

理想条件下所有商品，从生产资料、劳动力到生产、经营、服务、技术等领域的广泛选择权，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得以充分自由地流动，于是资本各要素得到了最有效率的分配，社会得到了最大的福利，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瓦尔拉斯到马歇尔憧憬的“一般均衡”状态。经济学家们从这样一些似乎苛刻的条件出发，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特征。“均衡论”成了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然而经济学毕竟是强调实证和规范的科学，而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们在经济现实中发现一般均衡并不存在。由于信息不充分，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高，市场不可能是充分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以增长为其基本特征，而增长会破坏

均衡，增长必须在非均衡下才能实现。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不时为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打破旧的均衡。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引发新的需求，于是一些行业兴起伴随着另一些行业衰落，旧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有待形成。非均衡论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现象，提出了言之有理的论断：经济活动本质上是非均衡的。

事实上，均衡论者和非均衡论者分别研究了经济系统两大动态转化机制：趋向均衡状态的稳定机制和打破均衡状态的生长、适应和选择机制。没有前者，经济系统将失去效率并因缺乏稳定性而解体；没有后者，经济系统将陷入无差别的静止状态，从而失去生机。

中国经济本身为典型的二元结构，而且是具有复杂成分的所谓“非匀质经济”。它表现为同一要素在不同行业、地区、单位和用途上的不同成本价格，表现为不同要素有不同的货币化程度。这种巨大的落差主要来自经济体制而非外部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双轨制和过度的行政垄断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消费品价格的双轨制、原材料价格的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及其与双轨制相互纠葛的行政性垄断。一方面造成受保护企业的不思进取，对稀缺资源的滥用；另一方面则使高效利用资源的企业，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由此可见，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造成了资本的不合理运用和极大的浪费，这里同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释放这一巨大潜能，既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除这种“非均衡性”

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从消除最表层的反差着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开放集贸市场起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逐步减少或消除了大部分产品、生产资料、乃至货币领域的价值扭曲所造成的价格的“落差”。现在，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经济潜能，正存在于千百万个企业资本配置的非均衡与不合理中。

二、经济增长率与要素配置方式

不同类型所有制的企业有不同的要素配置方式、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行机制。让我们用简单的 Cob-Doglass 生产函数分析推动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我们用固定资产净值、就业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工业净产值的增长，并对全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一对比。全国国有工业的数据来自 1988 年工业统计年报，时间从 1978 年到 1988 年。乡镇企业数据来自 1991 年统计年鉴，时间从 1978 年到 1990 年。净产值均按 1978 年不变价格换算（其主要结果如表 1-1）。

表 1-1 推动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增长的因素

	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
要素配置方式	计划	市场
净产值增长率%	11.29	16.95
其中：资本增加的贡献%	12.80	1.05
劳动力增加的贡献%	3.79	14.09
生产率增加的贡献%	- 5.30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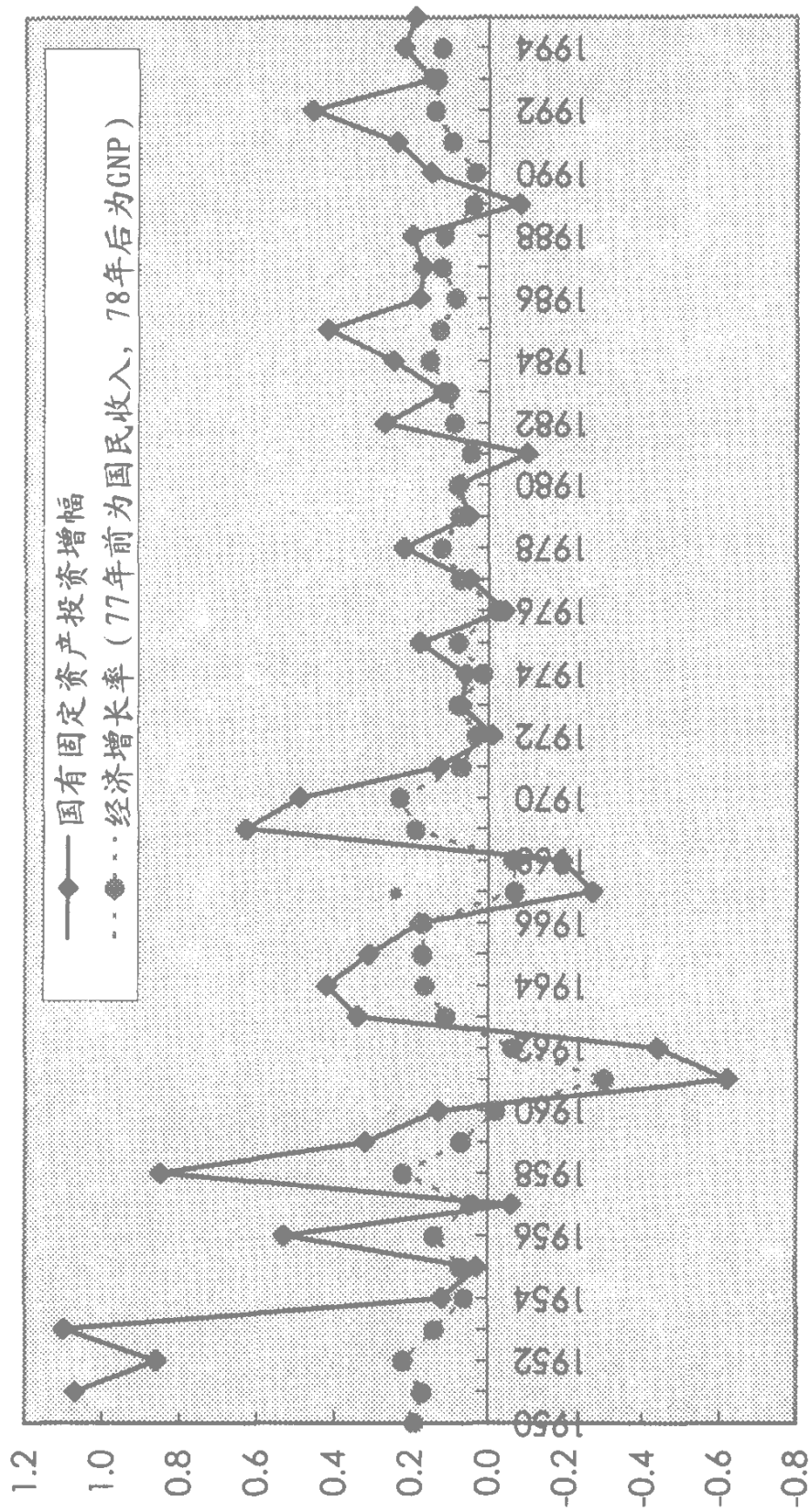


图1-1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增长

分析表明，全国国有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增加投资（参见图 1-1），而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靠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对增长的贡献是负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增加的贡献。而在人们的印象中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率却有所提高。这表明，资本的利用效率与其组合方式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在不同的企业中资本的利用效率有相当大的差距。调整资本的组合方式，改善其运行机制，从而发掘出其潜在的价值，使低效率利用的资本达到更高的利用水平，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能，这是整个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资本之源：资金与劳动力

缺乏一种健康、灵活的资金动员与利用机制，资金就会有如一只黑色的幽灵，作为有逐利性的通用价值尺度，其表现行为难以捉摸。财政、银行、企业和居民四大行为主体的资金来源与运用，展现了中国资金市场难以解释的困惑。

中央财政收支缺口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为了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对非国有经济，如集体、三资企业，实行低税政策，主要靠国有企业来支付社会改革成本。但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因体制、政策、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原因的改革滞后，使得